

記清宮傳世的一件

謝明良

北宋早期定窯白瓷印花碗



從作品的造型、紋飾以及胎釉特徵，可以認為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的一件定窯白瓷印花碗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的北宋早期。本文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嘗試追索該白瓷印花碗纏枝花葉的祖型及其隨著時代所產生的造型變化，希望能有利於掌握北宋早中期包括定窯白瓷在內宋遼瓷窯製品所見同類花葉紋的樣式特徵。其次，則是談談該印花白瓷碗圈足內陰刻「琅邪深甫」字銘的可能意涵。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宮傳世定窯白瓷印花碗，釉色白晳，有淚痕，圈足著地處之外施滿釉，內壁和底心模印纏枝花葉，外底圈足內陰刻「琅邪深甫」字銘，整體作工可謂講究。（圖一）筆者曾

經由該碗由下而上斜直外敞的碗壁，以及口沿切割成五花口等器式特徵，逕與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九九七）靜志寺塔基出土的定窯白瓷五花口碗進行比附，認為兩者造型一致，時代應該相近，提示臺灣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該白瓷印花碗的相對年代約在北宋早期，屬定窯模印印花製品的早期珍貴實例。（註一）學界一般認為定窯採用覆燒技法的印花製品約始於北宋中後期，（註二）而若以近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



北宋 定窯 印花牡丹花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期望因此而有利掌握北宋早中期，特別是十一世紀前半時期包括定窯白瓷在內宋遼窯製品所見同類花葉紋的樣式特徵。

北宋早中期葉紋舉例

北宋定窯的分期有多種不同方案，如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馮先銘所提示北宋前期（九六〇～一〇二二）、北宋中期（一〇三五～一〇八五）、北宋後期（一〇八六～一二二七）的三分期說（前引《定窯》），同八〇年代後期筆者之北宋早中期、北宋後期和金代的二分期說（前引《定



圖二 金大定24年（1184）紀年定窯印花模具 口徑22公分
英國原大維德基金會藏

窯白瓷特展圖錄》，以至近年秦大樹等人針對澗磁嶺窯區堆積將北宋定窯區分成第一期後段（九六〇～一〇一六）、第二期（一〇一七～一〇八五）和第三期（一〇八六～一二二七）等三階段（前引《考古》二〇一四年三期）。按理說，北宋定窯最爲關鍵的分期依據無疑是覆燒技法成立的時間點，然而定窯採行覆燒的確實年代卻不易釐定，目前只知其大約始於北宋中期。雖然直到最近仍有人指出北京遼重熙二十二年（一〇五三）王澤墓曾出土採覆燒技法燒成的定窯劃花瓷盤（註四），然而該劃花折沿盤雖與王澤墓出共同刊載於同一篇考古報導（《考古》一九七二年三期），其實是王澤墓西邊另一座遼墓的出土品，與王澤墓無涉。總之，儘管各分期方案或多或少都有其自以爲是的理由或依恃，但並非絕對。考慮及此兼爲敘述上的便利，本文的做法是簡化地將北宋時期平均成三個時段，即早期（九六〇～一〇一五）、中期（一〇一六～一〇七一）和晚期（一一七二～一二二七）。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白瓷印花碗通高約七公分，口徑二一公分，外壁光素無紋，內壁和底心以內模模印出牡丹纏枝花葉，亦即於碗壁等距置四朵牡丹花，朵花之間連接呈正面或側面的纏枝葉紋，內底心另飾正、側朵花和正面葉片。印花花葉呈突起的陽紋，其造型簡潔並以複線勾勒邊廓，幾乎予人減地凸花的錯視感。（同圖一）首先，應予留意的是，與該定窯碗葉片造型相近並且也是意圖表現立體效果的陶瓷器，見於相對年代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期的耀州窯高浮雕剔地青瓷注壺（圖三）；做爲廣義磁州窯系的河南省登封窯白釉剔花注壺亦見類似的高浮雕式葉紋（圖四），而相對年代約在十一世紀前期的同類型注壺葉片下方部位則代之以左右造型一致且鈎幅更劇的雙內鈎（圖五），結合此式注壺的器式編年，可知圖五注壺的年代應要略晚於圖三和圖四壺式，而其葉片造型也晚於圖一和圖三、四的年代。換言之，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印花白瓷碗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末至

古文博學院所發掘被視爲定窯中心產區的澗磁嶺窯區成果爲例，參與發掘的秦大樹等人認爲內模印花技法以及覆燒工藝標本均出現於北宋中期，亦即同文所稱第二期（真宗天禧元年（一〇一七）至神宗元豐八年（一〇八五））。（註三）問題是，定窯覆燒工藝的出現時代是否可與內模印花相提並論？或者說，所謂兩種技法均肇始於北宋中期一事只是就目前考古所見澗磁嶺區標本的遺存狀況而言？故定窯模印花的起源和發展仍需整合其他窯區標本和傳世作品再予評估。就此而言，上引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早期定窯白瓷印花碗已經意謂定窯內模印花技法的出現年代是要早於同窯覆燒工藝的創發年代。北宋期定窯印模見於澗磁嶺窯區北宋晚期地層，但無絕對紀年，而英國原大維德基金會則收藏一件帶金大定二十四年（一一八四）紀年銘定窯印花模具。（圖二）從目前的紀年資料看來，與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白瓷印花碗造型相近的定窯製品既見於前引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靜志寺出土品，

然晚迄十一世紀前期遼代蕭和夫婦墓亦見類似器式，其間的造型變遷遲緩，故大體器式可延續數十年之久。爲了釐定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印花碗的確切年代，除了器形外觀的比對

之外，有必要同時考慮印花碗纏枝花葉所反映的時代樣式。以下嘗試追索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白瓷印花碗纏枝花葉的祖型，並觀察此類花葉紋飾隨著時代的推移所產生的變化，



圖一a 「琅邪深甫」銘定窯印花碗 口徑2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b 同上內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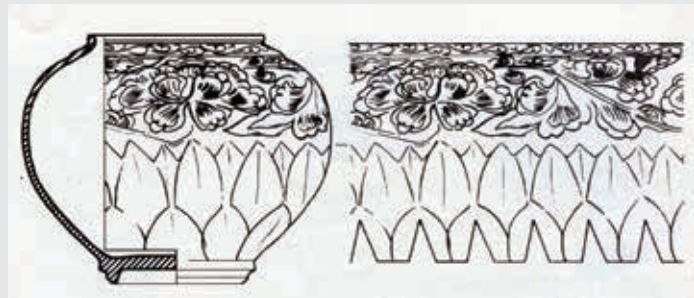
圖一c 同上底足



圖一d 刻銘拓片



圖七a 北宋 白瓷大口罐 高15公分 中國遼寧省阜新遼蕭和夫婦墓（4號墓）出土



圖七b 同上線繪圖



圖六 定窯刻劃花瓶（口頸部殘） 高32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五 北宋 磁州窯類型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
高20.4公分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四 北宋 磁州窯類型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
高17.8公分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圖三 耀州窯青瓷牡丹文水注 高18.5公分

十一世紀初期。

與圖五注壺壺身雙鉤葉紋造型相近的定窯白瓷可見於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口頸部位已殘佚的高瓶（圖六），後者器身下部浮雕多重仰蓮瓣，器肩上部飾牡丹纏枝花葉，花葉近邊廓處陰刻邊線以突顯紋樣。類似的於器身浮雕蓮瓣、蓮瓣上方刻劃牡丹花葉的定窯白瓷還見於中國遼寧省阜新遼代蕭和夫婦墓（四號墓）出土的大口罐。（圖七）從伴出的故晉國王妃耶律氏墓誌得知，蕭和卒於統合十五年（九九七）至太平十年（一〇二一）之間，妻晉國王妃逝於重熙十四年（一〇四五），並於同年秋合葬入蕭和墓中。儘管發掘報告書中並未涉及出土陶瓷到底是蕭和的隨葬品，抑或是其妻合葬時所攜入，僅就蕭和夫婦墓伴出陶瓷的圖片看來，個人認為其多數似乎應屬蕭和卒葬時的製品。本文無法在此逐一列舉相關細節，但就和本文論旨直接相關的葉紋和敞口碗式的變遷而言（圖七），大口罐所見葉紋造型特徵應要早於大阪東洋陶磁美術館的高瓶。

（圖六）考慮到多層浮雕仰蓮瓣定窯大口罐亦見於內蒙古遼開泰七年（一〇一八）陳國公主及駙馬合葬墓（《遼陳國公主墓》一九九三），或遼寧省朝陽遼開泰九年（一〇二〇）耿延毅夫婦墓（《考古學集刊》三，一九八三），雖說彼此細部造型不盡相同，但似乎是此一時期流行的器式之一。因此，蕭和墓大口罐以及同墓伴出的器形和前述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花碗相近的五花口白瓷敞口碗等陶瓷製品的相對年代就有可能是在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四半期。

定窯葉紋的變遷

儘管定窯覆燒工藝的確定年代不易釐定，但定窯以內模印花紋樣的年代至少可上溯九世紀晚唐時期。中國陶瓷探模具成形由來已久，以唐代而言，相對於初唐或盛唐時期經常可見利用外模成形並飾紋的陶瓷製品，中晚唐則頻頻地出現以內模成形、飾紋的作品。雖然，以外模飾紋紋飾在器物外側，以內模飾紋則紋飾在器內側，似乎透露了使用者目光視線和賞

鑑方面的變化，但陶瓷以模具成形兼飾紋乃是受到金銀器錘揲工藝啟發一事，可說已是學界的共識。（註五）姑且不論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見錘揲打製的青銅匜、盒、盤等製品，唐代金銀器的製作多襯以外模錘打，並且往往在外模打出的突起紋樣再襯以內模以便進行鑿花工藝而無憂變形。陶工汲取、學習金工匠師內外

模製器加工的原理，快速地移轉、複製到陶瓷的成型和裝飾工藝，也因此造成陶瓷器的造型和紋飾與金銀器雷同的現象。以紋樣而言，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印花白瓷碗（同圖一）以及（同圖三、五）注壺的纏枝花葉即是脫胎於金銀器的紋飾。（圖八）不僅如此，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花白瓷碗等作品所呈現之意圖營造紋飾立體感、並以複線勾勒花葉邊廓等裝飾意念，其實也是模倣自金銀器飾。

如果結合包括定窯在內的北宋朝瓷窯編年，不難發現剔地高浮雕或陽紋高起具立體感的模印花製品的年代多集中於北宋早、中期，而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定窯印花碗即為當中的一例。其次，應該一提的是，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宮傳世品中另有一件定窯白瓷印花碗（圖九），通高約七公分，口徑二〇公分，碗身自上而下弧度內收，下置圈足；口沿作六花口，鑲銅釦。從碗外壁由底足向口沿流淌的淚痕，以及圈足足根有釉等看來，應是採覆燒技法燒成。碗底心飾連枝花葉，內壁等距有四朵花接纏

花白瓷碗（圖十），印花紋樣雖亦屬四朵花纏枝葉，但朵花和葉片輪廓則屬單線勾邊，其年代似乎更晚。從印花螺絲釘式葉紋的造型特徵與磁州窯類型作品所見同類紋樣的比較（圖十一），可知後者單線勾邊印花紋六花口碗的年代約在十二世紀前期，即北宋晚期至金代初期製品；而原大維德基金會藏（現歸大英博物館保存）的金大定二十四年（一一八四）紀年陶模（同圖二）所見同類葉紋已趨華麗並更為裝飾化了。

這樣看來，定窯採內模印花的製品還可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的花口碗般的高浮雕式印花（同圖一、九、十），該類作品的紋樣保留了較多金銀器錘揲立體效果；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五花式口碗之外，遼寧省十一世紀前期蕭和夫婦墓的印花碗亦為一例（圖十二），晚迄北宋末期至金代仍可見到。（同圖十）另一類則是北宋後期至金代常見的平面式細印花（圖十三），後者圖紋豐富，部分作品紋

飾縝密，不僅具有宋代緯絲甚至宋畫寫生般的布局或場景，也是宋瓷之所以不愧為瓷史古典的有著高完成度、已然脫離金銀器流風的成熟之作。可以附帶一提的是，韓半島所燒造被視為十二世紀時期製品的高麗青瓷印花碗，也是採內模印花圖紋（圖十四），但其花葉紋樣卻酷似前述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花式口印花碗。（同圖一）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時代落差，若非是韓半島陶工採用了具有「古風」的



圖十二a 北宋 白瓷印花碗 口徑16.4公分
中國遼寧省阜新遼蕭和夫婦墓（4號墓）出土



圖十二b 同上線繪圖



圖十 北宋晚期～金 定窯白瓷印花碗 口徑2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北宋 定窯白瓷印花碗 口徑2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北宋晚期～金 磁州窯類型 綠釉黑剔花長頸瓶 高35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八 唐 銀鍍金 寶相華文貝形盒 口徑6.3公分

枝葉，佈局構圖似前引臺灣故宮五花口印花碗（同圖一），但兩者纏枝花葉的纏繞方向既有異，花葉造型亦不相同。不僅如此，相對於圖一的五花口碗之花葉均以複線勾勒輪廓，圖九這件六花口碗的朵花雖見複式邊線，但葉片則多以單線為廓。結合六花口碗式是北宋中後期以來流行的碗式，以及其所採行覆燒技藝的相對年代，可以推測圖九的該六花口印花碗或屬北宋中後期製品。與此相關的是，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宮傳世定窯另有一件同樣是以覆燒燒成的六花式口印

窯印花魚紋碗相近（註七），推測其應是金代陶工採用覆燒技法所燒成。有趣的是，該定窯殘件外底亦於燒成後陰刻「景深甫」等字，從字銘排列可以推測「景」字下方已缺佚部位應另有字，有可能原係刻「景□深甫」四字銘，而其「景」字筆劃酷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另一件定窯白瓷大碗碗底所見「穎川記」銘（圖十六）之「穎」字，故不排除「景□深甫」原應為「穎川深甫」？穎川即穎川，秦至唐代設穎川郡，轄境在今河南省中部，因穎水流經境內而得名。儘管故宮藏「琅邪深甫」碗的時代約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北宋前期，而該印花雙魚瓷片的年代則要晚迄十二至十三

世紀金代，但兩者「深甫」字跡相近，應屬同時代甚至是由相同作坊工匠所鐫刻。如果以上推論無誤，則對於鐫刻者而言，「琅邪深甫」白瓷碗已是百年以前的古物了。

從字面推敲，秦至唐代在今河南省中部設穎川郡，先秦至唐稱今山東省青島一帶為琅邪，故「穎川」和「琅邪」或指地名，「深甫」則似人名。其次，設若前述「穎川深甫」銘定窯瓷片確出自臨安皇城遺址，則其刻銘的年代則應上溯南宋。就此而言，北宋學者王回（一〇二三～一〇六五），字深甫，嘉祐二年（一〇五七）進士，任衛真縣主簿，稱病不就，退居潁州，同一時期的文學兼科

學家蘇頌（一〇二〇～一一〇一）曾知潁州，有〈補和王深甫潁州西湖四篇〉詩傳世，不過我們很難據此逕行推測王深甫其人和前述定窯銘文所見「穎川深甫」有關。相對的，南宋丞相謝深甫（一一三九～一二〇四），字子肅，封申國公，改封魯國公，官職顯赫，孫女道清又是理宗皇后，追封信王，改封魯王。由於「穎川深甫」定窯瓷片傳出自臨安皇城遺址，故不排除定窯銘文所見「深甫」是指理宗皇后祖父謝深甫？如果以上推論不誤，那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這件定窯白瓷印花碗在進入清宮之前，曾經是南宋宮廷收貯的古物。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圖十六a 「穎川記」銘定窯大鉢 口徑2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b 同上背圖



圖十六c 同上 圈足內字銘



圖十四 高麗青瓷印花碗 口徑14.5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十三 北宋～金 定窯印花蓮塘鴛鴦碟 口徑14.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a 定窯印花瓷片 傳臨安皇城遺址出土



圖十五b 同上圈足「景川深甫」刻銘

刻花內模，則是目前高麗青瓷的編年還有檢討的空間？無論如何，印花陶模不僅可長期使用，亦可複製，甚至流通販賣。上述印花陶模案例可以補強、省思工藝史上所謂時代風格或地域風格的內涵。

關於「琅邪深甫」字銘

前已提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定窯印花碗，圈足內陰刻「琅邪深甫」四字（同圖一），從筆劃刻痕可以很容易地判斷是入窯燒成之後才在釉上加刻而成地。由於《遵生八牋》的作者同時也是定窯等古物的著名明代收藏家高濂，字深甫，因此很容易讓人連想到「琅邪深甫」碗曾經高濂收藏，（註八）並在他鐫刻字銘之後才流入清宮。

另一方面，民間私人藏品當中包括一件傳說是近年採集自浙江省杭州南宋臨安皇城遺址的定窯印花雙魚紋盤碟殘片（圖十五），從標本圈足著地處施釉，以及內底的印花雙魚紋與江蘇省江浦南宋慶元五年（一一九九）張同之夫婦墓出土的定

定州花瓷

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

Decorated Porcelains of Dingzhou

White Ding War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Gallery 203

2013 11/30 – 2014 10/07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圖錄及相關商品於本院禮品部販售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釋

1. 謝明良，〈定窯白瓷概說〉，收入《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10-11。另外，上引文所提到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基出土相近造型的定窯白瓷碗彩圖可參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86。
2. 馮先銘，《定窯》，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1，頁164；中國硅酸塩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234；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7。
3. 秦大樹等，〈定窯澗磁嶺窯區發展階段初探〉，《考古》2014年3期，頁8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秦大樹等），〈河北曲陽縣澗磁嶺定窯遺址A區發掘簡報〉，《考古》2014年2期，頁23等。
4. 蔡玫芬，〈自然與規範－宋金定窯白瓷的風格〉，收入《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273。另外，蔡氏還提及遼重熙二十年（1050）平原公主墓出土的印花雙戲圖碗殘片（《考古》2011年8期，頁52圖12之8），認為其因和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以覆燒燒成的定窯印花雙戲紋碗碗式相近（前引《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108、109），進而主張該碗片亦屬覆燒製品（蔡，前引文頁273）。由於平原公主墓出土標本仍存，故該墓出土的印花雙戲圖標本是否採覆燒其實不難確認。筆者未見實物，但從報告書揭載的線圖看來，相對於北宋末至金代採覆燒工藝的定窯印花盤碗多於器內壁近口沿處飾一圈回紋或卷草紋，平原公主墓標本既無此類邊飾且雙戲印花紋佈滿內壁幾與口沿齊平，其裝飾布局應較近於十一世紀前期蕭和夫婦墓出土的以正燒燒成的印花碗（參見本文圖12）。
5. Margaret Medley, *Metalwork and Chinese Ceramics*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2); Jessica Rawson, 〈中國銀器和瓷器的關係（西元600～1400年）－藝術史和工藝方面的若干問題〉（呂成龍譯），《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4期，頁32-36；〈中國銀器對瓷器發展的影響〉（鄭善萍譯），收入《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258-278。
6. 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倣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II-15圖說以及前引《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94圖說等即主張「深甫」即「高深甫」。
7. 張同之夫婦墓報告見：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4期，頁66，圖23、24。原報告圖片不清，清晰圖可參見：劉濤，《宋遼金紀年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1，圖1之58，以及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江蘇·上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132確認。另外，河北省曲陽縣北鎮曾出土相似紋飾並且陰刻「劉家模子」字銘的金代定窯盤模，圖參見：北京藝術博物館

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頁246，圖213。

圖版出處

- 圖1 《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圖9；《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II-94。
- 圖2 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Oxford: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76), p. 111, fig. 73.
- 圖3 座右寶刊行會，《世界陶磁全集》10·宋遼篇，東京：河出書房，1955，彩圖3。關於耀州窯高浮雕剔地青瓷作品的年代，可參見：謝明良，〈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從所謂「柴窯」談起〉，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6卷2期，1998，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55-77。
- 圖4 白鶴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名品選》，神戶市：白鶴美術館，1989，頁30，圖34。
- 圖5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橫河民輔コレクション中國陶磁名品選》，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2，頁41，no. 27。關於磁州窯系高浮雕注壺年代的討論可參見：長谷部樂爾，〈北宋前期的磁州窯について〉，《東洋陶磁》1，1973-74，頁23-25；森達也，〈磁州窯系陶瓷生產的分布と系譜〉，《東洋陶磁》33，2003-2004，頁10。
- 圖6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東洋陶磁の美》，東京：株式會社美術出版社，2014，圖17。
- 圖7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萬雄飛等），前引〈阜新遼蕭和墓發掘簡報〉，頁37，圖7及頁41，圖15。
- 圖8 圖收入：前引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隋唐の美術》，圖45。
- 圖9 前引《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圖53；《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95。
- 圖10 前引《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圖54；《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103。
- 圖11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前引《東洋陶磁の美》，圖23。
- 圖12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萬雄飛等），前引〈阜新遼蕭和墓發掘簡報〉，頁37，圖8；頁41，圖16。
- 圖13 前引《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144。
- 圖14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2，頁53，圖44。
- 圖15 述鄭齋藏。另外，近十多年來杭州所出鐫刻有與南宋宮廷相關銘記的定窯白瓷數量不少，如：胡雲法等，〈定窯白瓷銘文與南宋宮廷用瓷之我見〉，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285-299及圖版152-233。
- 圖16 前引《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圖30；《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II-84。